中国反贫困斗争的伟大决战

（上接一版）江西井冈山，茅坪乡神山村，村干部制作好脱贫攻坚作战图，牢牢钉在墙上。

贵州乌蒙山，迤那镇五星村，扶贫工作队完成一笔一画绘制的扶贫作战图，小心揣进怀中。

相隔千里，两份作战图上，描绘的是不同的山川与村庄，勾画的却是一个个同样醒目的红色标注：那里代表贫困。

一张巨大的决战图，已迅速在中国大地铺开——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12.8万个贫困村，这是跨越中国中西部广阔版图的主战场；

“五级书记抓扶贫”，层层立下军令状、责任书，这是指挥高度统一的大会战；

19.5万名第一书记驻村，77.5万名干部帮扶，这是不拔穷根绝不撤退的突击队；

……

中国共产党执政体系上的各层“链条”全面转动。

每年脱贫约1000万人，意味着每月脱贫要达到近100万人，每分钟脱贫约20人，这是一场进入读秒时间的决战。

贫有百样，困有千种。

只有真正了解有着广阔疆域、苦难历史的中国，才能真正读懂中国反贫困斗争的艰巨。

一些贫困村、贫困户连找到都很困难——

贵州武陵山区腹地，一口刀村，村民田桂花家。

远远望去，仿佛挂在尖刀的刀背上。

举目皆是山，遍地都是石。即使是巴掌大的石缝间，也被栽下一棵玉米苗。家门口的1.5亩水田，是田桂花所在高毛组唯一一块水田，34户村民轮流耕种。

石头缝里求生存。村民们世代辛劳，世代贫苦。

一些贫困千年未解甚至被认为无解——

甘肃定西，千沟万壑，旱渴荒凉。

“陇中苦瘠甲天下”，100多年前，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的那声叹息至今仍回荡在历史的长空。40多年前，联合国专家来此考察，给出的仍是绝望的评价：“这里不具备人类生存条件”。

相比于自然条件，另一种贫困则集中于最难改变的思想观念领域——

云南滇西边陲山区，苦聪人寨子。

上世纪50年代，解放军从原始森林中找到这个拉祜族支系时，苦聪人一下子从刀耕火种、衣不遮体的原始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千年一瞬的巨变下，苦聪人转变观念仍在路上。

直到2014年，这里没人好好读过书，绝大多数不会说汉语，全村6岁至14岁的26个儿童全部失学。

“让娃读书吧！”帮扶干部黄素媛挨家挨户动员。

“娃还要砍草喂猪哩。”村民们难为所动。

黄素媛给村民们送来一台台34英寸彩电，条件是收了电视的家长得让孩子去上学。

终于，村里开始有了第一批学生，老师从教他们洗脸、洗脚开始。孩子们一点点开始汲取知识，家长们也越来越主动送孩子上学……

从历史中走来的决战，唯有以创造历史的坚毅才能攻坚，唯有以继承历史的奉献乃至牺牲才能打赢。

柴生芳，甘肃定西临洮县原县长。2014年8月15日，在连续工作超过17个小时后，45岁的他和衣睡在办公室里，再也没有醒来。身上的被子只盖了一角，一旁的萝卜只咬了一口。

这个戴着眼镜、本可一路顺风进高校、当教授的海归博士，怀揣一颗赤子之心，最终选择用生命为“苦瘠天下”的家乡亲人奔出一条脱贫之路。

在临洮的3年里，柴生芳转如陀螺：

323个行政村他走遍281个，写下29本工作日记；

偏远贫困的苟家山村，到县城来回需颠簸数小时，他去过11次；

临洮县贫困人口，从他来时的11万人，减少为不到5万人。

柴生芳走了。苟家山村村民从几十公里外赶来，与万人一同上街，为他送上最后一程。“县长来我家11次，连一口水也没喝过……”一位村民痛哭流涕。

李和林，四川南充市大林镇李家坝村原村支书。查出胃癌晚期后，依然与死神竞速般高强度工作，家里除了一台21英寸的老式彩电，一贫如洗，英年52岁；

姜仕坤，贵州晴隆县原县委书记。从放牛娃成长起来，立下“只要县里还有一个人没有脱贫，我就不能休息”的誓言，但常年高负荷工作，却最终让这个硬汉倒下，年仅46岁；

蒋富安，四川美姑县四峨吉村原第一书记，劳累猝死，告别26岁的青春。送别时，村民泪流满面：“你不是说好今后有了娃，也要送到村里幼儿园么？”

……

2013年至2016年间，120多名共产党员牺牲在反贫困斗争的决战场上，用生命与付出铺就百姓致富路。

乌江滚滚，在武陵山中逶迤蜿蜒。峡谷间，一艘艘小船正浮于江面，逆流而上。在村支书的带领下，一口刀村的村民们带着被条、猪油、斗篷……彻底搬离这座困住他们的大山；

六盘山下，定西在这场艰苦的鏖战中，“县不漏乡，乡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人”，走出了一条造血式扶贫新路；

吕梁山深处，一座座新村迎来易地扶贫搬迁的新主人，告别深山沟的乡亲们带着希望开始建设他们的新生活。

……

不屈于命运，不甘于贫困，竭尽拼劲、韧劲和闯劲，以伟大的决战标注民族精神的新高度

有一种精神叫“不屈”，推开甘肃定西扶贫开发纪念馆的大门，它扑面而来。

定西，年人均水资源量仅为全国三成。不毛的土山、漫天的黄土和山坡上踟蹰的放羊人，是人们最深的记忆。风沙吹了一年又一年，吹出人们脸上的皱纹沟壑一样深。

难道这里的土地只能生长贫穷？

定西人不信！

干旱缺水，定西人就发明“水窖抗旱法”，截至目前，定西已挖了30多万眼水窖；降雨少，小麦不行，就摸索种土豆，成了全国土豆三大主产区之一；冰雹多，地上庄稼常遭灾，就种根茎类药材，发展成全国中药材种植、加工和交易的重要基地。

有一种信念叫“不甘”，它鼓舞着人们铆足一股劲改天换地。

贵州省织金县核桃寨地处群山深处，无路，背篓伴随这里每一个人生。

娃娃在背篓里长大，又继续背着背篓起早摸黑在大山里讨生活。一条布满脚印的山中小道，当地人走起路来大都是身子向山壁一侧倾斜，脊背微拱，一手扶着土石树木，一手反背在后，托着背篓，抬头望向前方——这个姿势仿佛成了历史的定格。

背篓太小，装得下几口人的生计，却装不下一家人的幸福。山里的好东西运不出去，山外的好日子也背不进来。村民好不容易喂大的猪，准备赶到山下卖个好价钱，常常还没等赶出山，猪便累死在半路。老人对年轻人经常说的就是“有本事就出去别回来”。

村里出去的年轻人还是回来了。2011年春节，一个叫杨文学的青年揣着在贵阳用背篓挣下的13万元，回来装修新房。酒菜摆好，杨文学招呼大伙儿坐下来“摆龙门阵”：

“从小当‘背篓’，背了10多年，还是这么穷！”

“外面的路这么好，什么时候咱这也能有路？”

“难！怕是这辈子等不到了。”

……

你一言，我一语，几杯米酒下肚，愁云笼罩心头。

杨文学“腾”地站了起来：“不修房了，钱拿来修路，谁愿一起干？”

“干，再苦再难也要刨出一条路来！”饭桌上的人先是一愣，然后异口同声。

无路难，开路更难。热火朝天地干了两个月，毛路还没见影儿，没钱了。寨子里22名年轻人凑在一起喝了顿酒，第二天背上背篓再次出发“闯贵阳”，发誓“背条大路回故乡”。

杨文学们背篓筹钱时，“背篓哥修路”的故事在十里八乡传开来。人们被这些年轻人的梦想深深感动着：有捐钱的，有捐砂石的，寨子里越来越多在外地打工的人回来出工出力……

一千多个日夜，抹平了最后一块水泥，一条紧贴悬崖、跨越河谷、穿寨入户的两公里连寨路竣工了。

一通百通，核桃寨的“小康路”越来越宽。通路两年多来，寨子里盖了30栋新房。当年当“背篓”的年轻人放下背篓回来搞起了养殖和特色种植，产业已成规模。

脱贫有多难，这片热土上的人就有多拼。

杨文学们“背”出一条路的脱贫故事，在千里之外的定西、井冈山、秦巴山区，在全国每一个贫困角落上演着，一条条脱贫致富的新路正不断在人们的脚下伸向远方——

30多年前，定西顶着脱贫的巨大问号；30多年后，定西人把这个问号变成了巨大的惊叹号：贫困人口由1982年的170万人下降到2016年底的37万人，贫困面从78%下降到14%，农民人均纯收入从当初的105元提高到2016年的5854元。

90年前，井冈山的乡亲们手捧着分田地后收获的玉米，唱着《十送红军》送亲人；90年后，井冈山全市4000多贫困户靠着自强不息的精神摘掉了贫困的帽子。

“快顶不住时，就躲在屋里哭一场，哭完后，继续干活。”回忆起自己的脱贫路，井冈山荷花乡高陇村49岁的村民梁清香感慨万千。她身后，竹林掩映中的三层小楼格外引人注目。盖起这房子，她用了12年。

丈夫截瘫，公婆多病，儿女年幼，她从不叫一声苦，从下地种田上山种树，到养猪养牛，靠自己的双手一点点改变着贫困的现状……

每一个贫困户，都有一个自己的战场。

“宁愿苦战，不愿苦熬”。这是一幅写在篱笆墙上的标语，字迹歪歪斜斜，却振奋人心。

“为啥想到写这幅标语？”

“为栽花椒树，去年我在山坡上砍荒，到处是荆棘，双手流了很多血。但是，要想脱贫就不能当懒人。种花椒树跟红军打仗一样，剩我一个人也要打赢。所以我在墙壁上写了这八个字。”四川省通江县柳林村贫困户李国芝说。

柳林村，位于秦巴山区深处的一座山顶上，山下是通江县两河口乡。1932年，红四方面军挺进四川占领两河口，迈出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步。

“宁愿苦战，不愿苦熬”。这是当年革命精神的继承，是今天反贫困战场上人民群众的坚守。

改革是重锤。与贫困斗，唯改革者赢，唯改革者进

王洪梅，河南省滑县大子厢后街村党支部书记。

2016年12月12日，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今天有点阴冷，人们仍然热火朝天地在村里葡萄园干活，一座座现代化的葡萄大棚慢慢露出了雏形。这一切，都源于村里搞土地流转……60岁的王长发土地流转了，还长期在葡萄园打工，一年能挣近2万元。村民高兴，我心中也是美滋滋的。”

“土地流转”，这一载入中国反贫困史册的新词汇，标刻出当代中国又一新的巨大变革。

这不由让人们又想起了30多年前的那个冬夜——

安徽小岗村的一间旧屋内。

35岁的严金昌和另外17户村民以“托孤”的方式在白纸条上按出一片红手印，把村里土地包产到了户。第二年，严金昌等村民家的院子里第一次堆满了粮食。

30多年后，严金昌又一次按下红手印，将家中的10亩土地流转出去。第二年，他家年收入第一次突破10万元。

两次红手印，两次巨变，印证了同一个历史逻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与贫困斗，唯改革者赢，唯改革者进。

从前不敢碰、不敢啃的“硬骨头”被一一砸开，见证着改革的勇气，推动着反贫困斗争一步步走向胜利。

这是一场仍从土地入手的历史性变革——

“土地流转”，林权制度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带来了我国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

吕胜勤老汉这样讲述土地流转给自己生活带来的变化：“我现在是到地里上班了。”他说，“干的活轻松，离家还近。”

吕胜勤是山东菏泽市孟庄村人，他去年把家里全部5亩多地流转到牡丹专业合作社，开始收租金、给合作社当工人。

“5亩多地一年租金就是9000多元。”吕胜勤脸上一直挂着笑。

土地流转唤醒了农村“沉睡的资本”。截至去年，全国农村土地流转面积4.71亿亩，超过耕地总面积35%。全国农户家庭农场超过87万家，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超过188.8万家。

从山下的土地延续到山上林地，与土地流转“二重唱”的是林权改革。

上世纪80年代，由于一些历史原因，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方式的农村土地改革，没有延续到山上，山林一直属于集体所有。

回忆起那段日子，福建省武平县捷文村的村民李桂林感触颇深：“全村164户村民守着2.6万亩林地，却过着穷日子。”

2001年12月30日，李桂林领到了全国第一本新式林权证。转过年来的初夏，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到武平调研，作出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的指示，林权改革在福建全面推开。2008年，这项改革在全国全面铺开。

所有权明晰，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让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林农走上了致富路。

这是一场涉及干部责任的制度性变革——

改革贫困县考核机制，扶贫开发成为考核的主要内容，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减少贫困人口数量、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成为考核的主要指标。

“在2016年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中，我县考核结果全省挂末。对此，县委、县政府集体深刻检讨，作为县委书记和全县脱贫攻坚第一责任人，我负主要责任。”

2017年5月，贵州省天柱县委书记陆再义，在一次全省的大会上作出公开检讨。

看GDP，天柱并不差：在全省处中游，在所属自治州处上游，但作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因为贫困人口识别退出不精准，在这次全省脱贫攻坚综合考评中排名垫底。

在大会上作检讨，让陆再义深受震撼。“我们已经没有退路，到了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境地。”

县里四大班子专门建了“知耻后勇脱贫攻坚”微信工作群；16个乡镇对脱贫数据逐一进行入户调查核实；每月开一次脱贫攻坚大比武现场会，各战区各乡镇在擂台上晒成绩、亮短板……

改革带来工作重心的转变，广大贫困地区干部状态、当地贫困人口的生活面貌，都“脱胎换骨”。

贫困地区党员干部不再唯GDP，贫困乡亲的生活小事成了他们的心心念念。

罗军元，江西省农业厅派驻到井冈山新城镇排头村担任第一书记。翻开他的工作日志，就能感受到他日日挂心的“小事”：“搜集24个贫困户的‘微心愿’，让农业厅的同事认领；重阳节，为24个8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送上一床棉絮、一个暖手袋……”

“‘微处发力’让百姓待自己就像朋友一样，能够和我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罗军元说。

这是一场以市场为导向的根本性变革——

井冈山人便走在这条路上。

清晨，黄坳乡刚刚从沉睡中醒来，乡电商服务站的黄小华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从开业到现在一年多，寄出了1.7万多个包裹，价值160多万元哩！”拿着厚厚一沓快递单，黄小华告诉记者，这些寄出的商品大多是贫困户生产加工的，其中合作社入股的46户贫困户是最直接的受益者。

井冈山18个乡镇都有电商扶贫站点，“前店后村”的电商产业模式带动2446名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山东沂蒙山的农民也走在这条路上。他们竟把自己种的蜜桃卖到了6000公里外的中东迪拜。

历史上，沂蒙山“四塞之崮、舟车不通、外货不入、土货不出”。沂蒙深处的毛坪村，有着果业种植传统。过去这里出来的水果只在周边销售，果农辛辛苦苦一年挣不了几个钱。

将蜜桃卖到迪拜的人叫刘宗路。

2015年，他得知迪拜的蜜桃价格很高，但路途遥远，往往还没运到迪拜就已经腐烂了。

别人听个热闹，刘宗路却上了心。随着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刘宗路越发觉得万里之外有商机。

他跑到上海，请教国内水果保鲜权威专家，改进储存方法；咨询了海关，改进了报关流程……

刘宗路成功了。4万斤蜜桃到达迪拜，基本完好无损，几毛钱一斤的蜜桃，在迪拜卖到了十几元。

思路一变天地宽。

全面深化改革，打开了脱贫的万千路。

一根稻草抛不过墙，一根木头架不起梁。扶一把，送一程，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为反贫困斗争凝聚无坚不摧的伟大力量

入夜，秦巴山区深处的甘肃宕昌县。微弱的煤油灯下，一个男人攥着木炭，在坑坑洼洼的泥墙上一笔笔画着：

车头、车轮、车厢……粗糙的墙面上，浮现出一列火车的轮廓。

“这就是火车？”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一辈子从未见过火车模样的农民杨尕女，问专心画画的丈夫。

“是啊。听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不知道咱这穷山沟里，啥时候能见到真的火车？”男人说。

大山深处画火车——这是20多年前一个闭塞的贫困山区农民对山外世界最深切的渴盼。

门前万重山，抬脚行路难。在其他类似的连片特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指望仿佛山间游丝般的小路，总是被连绵不绝的大山吞没。

要致富，先修路。从兰州到重庆修一条连接西北、西南的铁路大通道，秦巴山区正是关键节点。

然而，让墙上的火车变成现实，谈何容易。

这里的地质属于隧道施工领域的世界难题。以最艰巨的胡麻岭段为例，地层含水量最高达28%，堪比“水豆腐”，不时涌水、涌砂，严重时甚至如泥石流般掩埋隧道。

在铁路隧道施工中享有盛誉的德国专家，曾专门自带顶级设备和施工团队到胡麻岭应战，以失败告终，离开时留下一句话：“不可能在这种地层中打隧道。”

然而，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家庭里，扶贫从来不是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个人的事。“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大扶贫格局完整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扶贫道路上，再难的障碍也能跨越。

于是，千里兰渝线，集结了10万筑路大军——全国最优秀的专业技术人才、最富经验的作业队伍、最先进的机械设备。面对前所未有的高风险地质状况，坚韧顽强的建设者们挤牙膏般一点点向前推进。

2017年6月19日，胡麻岭隧道终于贯通了！兰渝铁路在历经近9年的艰苦奋战后，一举扫除了全线开通的最后障碍。

这条铁路，从百年前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规划中走来，从20多年前贫困农民墙上跃出，终于在中华民族反贫困决战中贯通，给沿线数百万贫困人口送上最珍贵的礼物。

“没有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没有党和政府对贫困地区的深切关怀，类似兰渝铁路这样高投入、高难度的‘扶贫路’如何能修得成？”全国扶贫宣传教育中心主任黄承伟感叹。

集中力量攻坚是优势，对口帮扶同样是我们的优势。作为祖国大家庭的儿女，你帮我一把，我扶你一程，目标就是实现共同富裕。

宁夏永宁县，闽宁镇。

站在自家宽敞的小院里，63岁的谢兴昌可以望见镇区一排排新房，宽阔的马路直直伸向远方的贺兰山。

“当年那个‘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砂石跑’的荒滩，要是没有福建亲人的帮助，怎么能一步步变成如今的样子呢？”

谢兴昌的感慨来源于21年前，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为组长的“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正式成立，“闽宁扶贫协作”大幕开启。

从那时起，一批又一批援宁干部真心奉献，数以万计的闽商在宁夏创新创业，几万宁夏贫困群众在福建稳定就业，创造出对口协作实现共同发展的成功范例。

20年后，还是在宁夏这片土地。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推动东西扶贫协作继续迈向新的征程。

谢景军，武警河南省总队医院的一名军医。一年的援助青海时间里，他承担的手术就有200多台。2014年6月，谢景军满载荣誉回到河南。

一进家门，同为医生的妻子见面后的第一句话，让他自豪与感动涌上心头：“老谢，今年的援青任务下来了，我报名了。现在我把家交给你，我也要到青海为那些需要救助的患者尽一份力。”谢景军将妻子拥入怀中。

丈夫归来，妻子接力。多少支援贫困地区的各界人士，如同这对质朴的夫妻一样，舍小家为大家，为贫困群众的美好生活不懈奋斗，有的甚至献出生命。

从江南鱼米之乡的浙江湖州，到大漠戈壁荒原的新疆柯坪，援疆干部黄群超一门心思为当地谋脱贫。反复研究后，他决定把湖州生长发育快、繁殖周期短的湖羊引进柯坪，作为农民增收突破口。

2014年底，在黄群超精心“护送”下，1600只湖羊种羊从太湖南岸启程，踏上了数千公里的“西迁之旅”。

一路上，他和同事们不敢休息，每隔4个小时就要停车看羊，补充饲料和水。历经3天4夜，辗转7省份，1600只湖羊全部到达目的地。

如今，这些湖羊已产出数千只羊羔，成了当地人脱贫的希望。

2015年8月，黄群超突发心脏病栽倒在地，再也没有起来。

遗体火化那天，妻子汪素琴和儿子黄卓尔在当地种下一棵杏树。儿子含泪一边培土，一边说：“爸爸，这棵树就是你的眼睛，你可以一直守在这里，看着这山、这水，这里的百姓。”

“来的时候是一粒种子，离别的时候要满园硕果。”刚来援疆时，黄群超曾在日记本里留下这样的期待。

他的一半骨灰，永远留在了柯坪。

大扶贫格局的优势，还体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策的快速精准实施。

投钱——在财政转移支付基础上，为中西部地区专设了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2017年资金规模超过860亿元；

派人——全国向各地贫困地区派驻了近80万名帮扶干部，与困难群众同甘苦、共奋进，攥着劲瞄准脱贫目标；

搬迁——自2016年至2020年，一次足以改写历史的大迁徙在中国大地进行，约1000万贫困人口将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告别世代生活的贫瘠土地，走向新的生活。

“我们都搬下山来了，今后的娃娃可能都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搬来的，应该记录一下村子的历史。”甘肃省文县丰元山村的木匠张代全不顾身体残疾，当起了当代的“司马迁”——写“村史”。

“丰元山村有四大姓，大多从清代嘉庆年间搬迁而来。穷了一辈又一辈，直到扶贫搬迁才看到新的生机……”

张代全笔下的村史，述说着丰元山村的变迁，折射的却是反贫困斗争伟大决战的真实画卷。

……

时间，是最忠实的记录者。

2000多年前，中国先人发出“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希冀，开启了对温饱和幸福的期盼；

90年前，秋收起义的一支部队翻越莽莽罗霄山后，抵达井冈山的茨坪，“红军来到掌政权，春光日子在眼前，穷人最先得好处，人人都有土和田”，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反贫困斗争的最初实践；

60多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反贫困提供坚实的政治制度保障；

30多年前，改革开放大幕开启，大规模人口脱贫迈入新进程；

5年前，面对中外记者，习近平发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宣言，吹响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锋号；

再过3年，中华民族将历史性地摆脱绝对贫困，全体中国人将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的崭新时代。

千年梦想，浓缩于未来一千多个日日夜夜；

世纪担当，扛在我们这代共产党人的肩头。

百年初心不改，百年前赴后继。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咬定目标、勠力攻坚，我们一定能决战决胜，创造反贫困斗争的人间奇迹。（新华社8月13日电）

确保把州庆办出特色办出成效

（上接一版）作为休闲广场，红太阳广场一定要按照公园建设理念来打造，结合实际，着眼长远，在绿化、美化、亮化上下功夫，在体现民族文化上下功夫，在为民提供便利上下功夫。

在香格里拉大剧院，齐建新一行走进剧院了解舞台及灯光设计。强调，要全面做好舞台灯光调试工作，鼓足干劲，积极动员攻坚，冲刺项目建设最后阶段。要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及时整改到位，确保万无一失。要组织人力，抓紧时间搞好剧院卫生。

在迪庆香格里拉民族体育中心综合体育场调研时，齐建新指出，作为州庆活动的重要场所，一定要把各项工作做细做实。针对存在问题，要抓紧时间尽快整改到位，全面做好场馆的保洁工作；要尽快完善嘉宾接待室相关设施，认真谋划室内采光、墙体装饰等细节工作。同时，要借助州庆这一历史机遇，进一步完善场馆设施设备。下一步，要充分利用好场馆开展其他活动。场馆整体宣传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党的治藏方略。

齐建新要求，当前，离州庆已不足一个月的时间，时间紧、任务重。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危机感和紧迫感，加快推进各项目建设收尾工作；要着力在细节工作上下功夫，力争做到尽善尽美；要加大节日喜庆氛围的营造工作，着手陆续开展城市道路保洁工作；各部门要积极参与配合，高规格、高标准完成临街建筑灯光美化工作，以全州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举全州之力，迎接迪庆藏族自治州成立60周年的到来。

副州长松涛、和丽萍，州文体广新局、香格里拉市政府等部门负责人陪同调研。

近日，国家级、省级林业资源检查组到香格里拉市检查第九次全国森林资源连续清查内外业工作。检查组采取随机抽查、远近结合的方法抽查监测3个样地点，涉及建塘、格咱、虎跳峡3个乡镇。清查数据待省林业厅审核，提交省政府发布后，将正式提交香格里拉市。（杨云萍 摄影报道）

遗失声明

●香格里拉县小中甸镇和平村结组牦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33421NA000489X。

●香格里拉县小中甸镇和平村结组牦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证号：云国税字533421064282131号。

●香格里拉市达安汽修汽配，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33421600094522。

注销公告

●迪庆开发区金沙废旧金属加工铸造有限公司，李伟东，营业执照注册号：533400100000397，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香格里拉县原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丽刚，营业执照注册号：533421100018898，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云南香格里拉玛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叶红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3421067140278D，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登报作废

●香格里拉县民贸大楼有限责任公司，曹华勋，不慎遗失公司财务专用章一枚，现将原章登报作废。